

南亚区域认同与区域合作

吴兆礼*

摘要 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南亚区域合作起步晚、成效低，南亚各国在区域认同和区域定位导向上是有差别的。一方面，独特的地理单元，印度文化影响，共同反抗殖民统治的历史，相似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这些因素对培育南亚区域认同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南亚地缘政治格局、国家间冲突与矛盾、域外力量影响等因素也对南亚区域认同构成阻碍。而且，南亚权力格局不对称、印巴关系僵局以及印度对南亚区域合作机制作用的认知变化，对南亚区域合作成效与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和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作为典型案例，分析南亚区域合作的进展、成效以及方向。

关键词 南亚区域认同；南亚区域合作；南盟；印巴对抗

* 吴兆礼，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区域认同是区域主义和区域合作的基础，国家对区域的认同和参与是区域机制或区域制度构建的关键。区域主义需要政治和谐、经济相互依存和区域认同三个支柱的有力支撑，缺少任一支柱都会使预期收益同实际结果产生差距。^① 自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以来，地区主义一直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力量。几乎所有国家都认为，区域主义有利于其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和平与安全，区域主义也日益被视为应对地区以及全球化挑战的重要机制。与东盟和欧盟区域主义快速发展相比，南亚地区在形成制度化的区域合作框架方面启动相对较晚，其进程与成效也受到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制约。

有学者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认为南亚国家间存在共同特征，即社会和文化同质性、共同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政治与经济上相互依存、地理接近。^② 但也有学者始终质疑南亚是否是一个“区域”概念，更有学者认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简称南盟）的成立并不是基于区域认同或区域建设，而更多是建立一种比域内双边合作更有效的社会经济发展合作秩序的权宜之计。实际上，南亚区域主义的发展以及南盟的成立、进程与成效，表明南亚各国在区域认同和区域定位导向上是有差别的。国家实力不对称、双边矛盾与冲突、国内与区域内种族与宗教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国家战略及优先事项等，尤其是危机、矛盾与挑战，一方面成为南亚国家凝

^① Aditi Paul,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Exploring the Three Pillars of Regionalism and Their Relevance,” *The Journal of Indian and Asian Studies* 1, no. 2 (July 2020): 1–22.

^② Bruce M. Russett, *International Reg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logy* (Chicago: Rand McNally and Company, 1967).

聚区域共识和开展区域合作的驱动力量，但同时也对区域认同形成制约，对区域合作成效产生负面影响。

一、南亚区域认同历史演变

认同或者身份，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在心理学、社会学以及越来越多的人类、文化和区域地理学中使用，^① 而区域认同属于集体认同范畴，^② 它反映了区域成员之间在历史、语言和意识形态上的共同性，并有助于协调区域内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活动。与其他地区的区域认同相似，为更好地理解南亚区域认同的性质、差别和复杂性，需要从四个维度对南亚区域认同进行综合评价，即定义特征、测度方法、因果关系或相关性，以及识别和描述。由于南亚的种族、宗教、语言、文化、政治、领土和历史的多样性，加之国家间地缘政治现实矛盾与冲突，南亚区域认同的程度和潜力都大打折扣。总体上，作为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南亚各国处于相同文化圈的辐射范围，有共同的殖民与反殖民历史，在地区主义不断发展的潮流中，南亚区域认同有一定的基础。然而受地缘政治尤其是国家间冲突矛盾影响，南亚区域认同度较低。

① Burke Peter J. and Stets Jan E., *Identity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 Keating Michael, *The New Regionalism in Western Europe: Territorial Restructuring and Political Chang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8).

（一）南亚区域认同共识形成的地理、历史与文化因素

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认为，“地区不只是地图上可以被直接和客观描述的有形空间……区域也是根植于政治实践的社会与认知建构”。^① 对于南亚区域认同的考察，其独特的地理单元、印度文化的影响、殖民统治与反殖民斗争的历史，应该成为研究的起点。

南亚是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从地理上看，北有喜马拉雅山脉把南亚与亚洲大陆主体隔开，东、西和南三面为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和印度洋所环绕，在地理上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因独特的地理条件，南亚次大陆形成了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域的文化特征。对此，有学者指出，“它是一个拥有文化、语言、宗教和历史的地区，有自己的身份标志”。^②

南亚也处于印度文化及其涵盖范围。古代南亚地区存在与西方罗马体系、东亚朝贡体系和近代国际体系并列的“大法体系”，其由孔雀王朝时代阿育王建立，以印度宗教中的“法”（Dharma）为合法性基础，具有“强文明体、弱组织体”的特点。该体系下族群间的融合度较低，国家间的联系松散而脆弱，国家力量有限。在此体系下，国家认同和凝聚主要是宗教上的，而经济联系十分脆弱，

^① Peter J. Katzenstein, “Regionalism and Asia,” *New Political Economy* 5, no. 3 (2000): 354.

^② Aditi Paul,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Exploring the Three Pillars of Regionalism and Their Relevance,” *The Journal of Indian and Asian Studies* 1, no. 2 (July 2020): 16.

政治上则通常是分裂和离心的。^① 佛教作为昔日“大法体系”合法性基础及连接“大法体系”下各行为体的精神纽带，在南亚地区已发生很大变化。南亚国际体系的“强文明体、弱组织体”特点一直影响到近代。而南亚地区的“大法体系”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印度某些政治和知识精英心中的“大印度圈”与“大国”梦想中。^②

西方殖民与“南亚次大陆”的影响延续。15—20 世纪的五百年中，欧洲殖民者，包括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先后入侵南亚地区，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印度沦为殖民地，阿富汗被迫成为英俄之间的缓冲国，尼泊尔也长期遭到英国殖民者的控制。殖民者用武力使印度次大陆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地域统一，并实行了有效统治，这也导致次大陆在地缘上基本是一体的。实际上，在西方殖民者征服统治次大陆的整个历史阶段，“这是一个不仅存在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对立的国家，这是一个建立在所有成员之间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排他思想所造成的均势上面的社会”。^③ 这也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以及能被殖民者“分而治之”的重要原因。因殖民历史，除阿富汗和尼泊尔之外，印度、巴基斯坦、孟

① 尚会鹏：《论古代南亚国际体系——“大法体系”的特点及原理》，《国际政治研究》2015 年第 5 期，第 9—27 页。

② 张金翠：《〈政事论〉与印度外交战略的古典根源》，《外交评论》2013 年第 2 期，第 119—130 页。

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 856 页。

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都是英联邦成员。^① 这些国家的地区认同，明显带有殖民历史的印记。

（二）南亚区域认同共识“赤字”

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南亚”概念的外部构建。20世纪40年代以来，南亚国家先后摆脱殖民统治，南亚地缘政治版图逐渐形成。巴基斯坦和印度于1947年8月相继独立，斯里兰卡于1948年2月独立，马尔代夫于1965年7月独立，1971年3月东巴基斯坦宣布独立并于1972年1月建立孟加拉国，至此南亚地区的政治版图由八个国家组成——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马尔代夫、阿富汗。然而客观来看，将印度次大陆称为“南亚”（South Asia）更多的是源于外部建构。20世纪60年代，欧美的大学开始广泛采用“南亚”一词，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开始使用“南亚”来界定这一区域。^②

区域认同较为混乱。随着南亚地缘政治版图的逐渐形成，南亚区域认同却停滞不前，甚至呈现混乱与倒退趋势。对于20世纪50—70年代这30年南亚区域认同现状，有学者明确指出，南亚国家有着充分与确切的地理上的南亚身份认知，但缺乏有效的、足够

^① 巴基斯坦曾于1972年退出英联邦，后于1989年重新加入。马尔代夫于1982年加入英联邦，2016年宣布脱离，后于2020年重新加入。

^② 林民旺：《南亚的地缘政治博弈及其战略格局的演进》，《云大地区研究》2019年第2期，第112页。

的、真切的和观念上的地区认同，南亚区域认同甚至呈现“赤字”状态。^①实际上，对于是否属于南亚身份，甚至一些地区国家也并没有完全认同自己的“南亚身份”，例如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都曾希望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简称东盟），印度甚至认为缅甸属于南亚，^②阿富汗自身和南亚国家也都不认为阿富汗具有“南亚身份”。

国家生存与国家安全优先导致意识形态认同超越了地理空间认同。实际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很长时期内，南亚区域认同更多是呈现出“既没共同区域，也没共同利益，有的只是国家生存与国家安全”。民族国家建立和民族主义高涨，使次大陆内部原有的联通性和共通性由于国家边界的逐步确立而被人为地切割开来。^③“两个民族”理论是印巴分治的重要因素，导致印度次大陆地缘政治版图的构造性断裂，其间，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过三次战争，彼此视对方为国家生存与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同时，印度将南亚次大陆视为其势力范围，推行“印度版门罗主义”，导致印度与邻国关系存在系列矛盾与分歧。而且，南亚国家自身内部也存在多种挑战——分裂、分离、反叛以及动乱，这些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应对内外挑战，确保国家生存与安全，成为地区国家的优

① 陈翔：《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发展现状及前景》，《国际研究参考》2015年第6期，第12页。

② 林民旺：《南亚的地缘政治博弈及其战略格局的演进》，《云大地区研究》2019年第2期，第113页。

③ 同上。

先事项。

出于安全需要，南亚区域认同中意识形态认同取代了地理空间认同，跨区域结盟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重要手段。为此，巴基斯坦于1954年5月与美国签订《美巴共同防御协定》，同年9月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1955年9月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后于1959年8月改名为中央条约组织，CENTO）。可以看出，寻求安全是巴基斯坦自独立以来一贯追求的外交政策的核心，通过与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结盟来应对印度威胁。印度则与苏联在1971年8月签署《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这一时期，印度与巴基斯坦都通过寻求与区域外军事集团的结盟或准结盟来维护国家安全。

“大印度联邦”与巴基斯坦区域认同的“脆弱”与“困惑”。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印度区域认同的重要特征是“大印度联邦”设想，认为南亚是印度的南亚。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或者说“印度中心论”继承了英国殖民政府的政治战略思想。这个以印度文化圈为基础、印度民族为主体的“大印度联邦”计划，在当时的“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与印度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有着深刻的影响。尼赫鲁的心中一直隐存着一个“大印度联邦”计划，期望巴基斯坦、克什米尔，甚至更多的国家或地区纳入“大印度联邦”。尼赫鲁认为，“小的民族国家是注定要灭亡的，它可以作为文化上的自治区苟延残喘，但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单位”。^① 实

^①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齐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第712页。

际上，所谓的“大印度联邦”包括所有受南亚次大陆文化影响的区域，以及英国在南亚次大陆周围所有的原殖民地，包括并不限于现代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斯里兰卡、阿富汗的一部分、尼泊尔、不丹、锡金甚至中国西藏自治区的一部分。

巴基斯坦区域认同的“脆弱”与“困惑”在南亚国家中最具代表性。有学者发现，巴基斯坦与南亚其他国家相比有着非常不同的历史和性质。首先，除了英属印度帝国时期，巴基斯坦各地区曾经很少是任何南亚的一部分，即使是最东部的巴哈瓦尔布尔也效忠于喀布尔而不是德里。卡拉特地区只在17世纪向莫卧儿朝廷效忠了几十年，从那时起它更偏向波斯或阿富汗。其次，他们的统治者几乎不是印度意义上的“王公”，这些王国也主要是部落，这与印度明显不同。只是在英国统治时期这些“土邦”与印度建立起非常紧密的联盟，印度统治者也试探性地在这类土邦身上烙上了“印度”的身份。事实上，组成的“土邦”更多是中亚、波斯、阿富汗和印度习俗和传统的独特混合体。基于这一地区相当复杂的历史，以及对更“穆斯林化”的普遍渴望，巴基斯坦在独立后走上了伊斯兰化的道路。巴基斯坦开国总理利亚卡特·阿里·汗（Liaquat Ali Khan）决定巴基斯坦应该更多地向中东和阿拉伯国家寻求灵感，他改变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专注于南亚地区的传统。然而，这种激进的转变让巴基斯坦感到困惑和孤独，因为它既没有被阿拉伯俱乐部所接受，也没有像伊朗那样为自己的地区身份感到自豪，同时它试图与南亚

脱离关系。^① 因此，巴基斯坦的区域身份认同是较为脆弱的。

总体上看，印度曾设想将南亚地区的所有国家都纳入其“大印度联邦”框架，始终认为南亚是印度的南亚，其对南亚区域认同最为强烈。一些南亚国家则认为其地域属性并非唯一。阿富汗定位其是南亚与中亚的联结与枢纽；巴基斯坦认为其是连接南亚、中亚和中东的十字路口，甚至自认为是包括阿富汗在内的“大中东”的一部分；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认为其是南亚与东南亚的桥梁。显然，南亚各国都有着定位不同的区域认同，各国间认同的共识很弱，存在区域认同共识的赤字。

二、南亚区域合作进程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南亚的地缘格局基本形成。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国家在对外政策中奉行不结盟，而巴基斯坦也从70年代开始从奉行结盟转变为不结盟。同时，南亚各国的内部族群矛盾和教派矛盾仍十分突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较为普遍，地区国家间分歧、矛盾与冲突也时常激化，和平、发展、繁荣与稳定成为地区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南亚的区域认同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成立为标志，南亚区域合作进程开始起步，这标志着各国有了一定的区域认同共识基

^① Yaqoob Khan Bangash, "Pakistan 'in' South Asia," *The Express Tribune*, September 10, 2012, <https://tribune.com.pk/story/434353/pakistan-%E2%80%98in%E2%80%99-south-asia>.

础。然而，受印巴矛盾影响，南盟框架下的区域合作成效不佳，印度为此开始强化以“孟不印尼”（BBIN）为主的次区域合作和以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为代表的次区域合作。

（一）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1977年，时任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Ziaur Rahman）倡导成立南亚区域合作组织，并于1980年倡议召开高级别会议讨论区域合作事宜。1983年8月召开的南亚七国^①外长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南亚区域合作宣言》和《综合行动纲领》两份文件，标志着南亚区域合作正式启动。1985年12月，第一届首脑峰会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召开，峰会发表《达卡宣言》并签署《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宪章》，这标志着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正式成立。

南盟的合作领域从社会民生逐渐扩展到经贸与安全。南盟成立之初，成员国意识到彼此脆弱的双边关系和对国家安全、主权的不妥协立场，认为最好在无争议、非政治和不干涉但互利的领域进行合作。因此，为推进南盟合作开展，南盟成立初期将农业、气象、卫生、交通和科技等作为合作的主要领域，避开政治、经济与安全问题，为此宪章明确规定“不讨论双边以及有争议的问题”以打消

^① 南盟创始成员包括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斯里兰卡及巴基斯坦七个国家。

各成员国疑虑。^① 实际上，1987年第三届南盟峰会通过的《关于防止恐怖主义的地区公约》以及1993年签署的《南亚优惠贸易安排》，标志着南盟合作已经进入非传统安全领域和经贸领域。2004年第十二届南盟峰会达成《南亚自由贸易区协定框架条约》（FA-SAFTA），2006年《南亚自由贸易区协定》正式生效，区域经济合作与贸易自由化进程加速。2005年11月第十三届南盟峰会决定成立南盟能源中心以进一步促进能源合作，2010年4月南盟第十六届峰会签署了《南盟服务贸易协定》。

南盟机制建设取得进展。南盟框架下先后设立了峰会、部长理事会、常务委员会、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特别部长会议、经济合作委员会和区域中心等机构，成员也从创始七国发展到八个成员国和九个观察员。2005年11月，第十三届峰会同意吸收阿富汗为新成员。2006年8月，南盟第27届部长理事会审议通过南盟观察员指导原则，并陆续接纳观察员。目前，南盟吸纳了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缅甸、美国、欧盟、澳大利亚、伊朗和毛里求斯在内的九个观察员。

南盟合作成效较低。因南盟框架内的合作机制，尤其是在政治与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机制存在缺失与不足，导致南盟机制成效受到影响。而且，1998年印巴核试验和21世纪以来南亚地区地缘政治形势发展，导致南盟框架内合作发展曲折。对此有学者认为，南盟

^① 曹峰毓等：《南亚区域合作的历程、成效及挑战》，《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10期，第76页。

在组织扩容、合作领域增加以及自身机制建设等方面取得重大发展与突破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困境与麻烦，包括自由贸易区进展缓慢且发展水平低下、政治与安全方面的合作进程缓慢、联盟机制仍然相对落后、对促进地区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作用有限等。^① 甚至有学者认为，南盟的成立并不是基于区域认同或区域建设的真实体现，其更多是建立一种比区域内各国间双边合作更有效的社会经济发展合作秩序的权宜之计。

南盟合作陷入僵局。2014年，印度邀请南盟国家领导人参加莫迪总理新政府宣誓仪式，并随后出台了针对南亚邻国的“邻国优先政策”（NFP），从中可以看出印度希望将南盟塑造为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区域合作组织。第18届南盟峰会通过了《加德满都宣言》，强调加快推动区域一体化建设，加强在贸易、投资、金融、能源、安全、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以及文化领域的合作，优先推进区域和次区域内项目。然而巴基斯坦在本次峰会上对印度提出的互联互通倡议持反对立场。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因2016年9月发生的“乌里恐袭”事件显著上升，印度带头抵制原定于2016年11月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第十九届峰会。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南盟国家为应对疫情召开多次线上会议，印度还启动新冠信息交流平台“CoinEx”，但南盟出现的新转机随后被阿富汗政局变化以及印巴间根深蒂固的矛盾所吞噬。

^① 陈翔：《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发展现状及前景》，《国际研究参考》2015年第6期，第11—12页。

（二）“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①

发展是南亚国家的优先课题。尽管南亚区域整体合作陷入停滞，基于共同发展的利益，次区域合作存在利益共识，如“南亚增长四角”（SAGQ）的发起与发展。1996年底，孟加拉国总统提议建立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和尼泊尔等四国为参与方的次区域合作新模式。1997年4月，四国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行首次会议，会议围绕在南盟机制外形成四国次区域合作达成共识，并在尼泊尔的建议下将四国间的次区域合作称为“南亚增长四角”，会议同时发布了关于“南亚增长四角”的七项目标与原则。^②“南亚增长四角”是孟加拉国和尼泊尔试图避开印巴对抗而寻求次区域合作的努力与尝试，其定位于寻找解决南亚次区域经济社会问题的现实出路，不追求次区域“市场一体化”，而是以项目为导向，并且认为这个机制具有地理毗连、文化传统相似等先天优势。^③然而，受南亚地区政治环境、基础设施条件以及相关国家内部缺乏共识等因素的影响，“南亚增长四角”的进展在初期阶段十分缓慢，甚至更多停留在概念阶段，尤其是“南亚增长四角”发展初期部分成员国内

① 吴兆礼：《印度推进“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的政策路径》，《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5期，第34—43页；吴兆礼：《印度推进“孟不印尼”合作：诉求与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第70—84页。

② Ishtiaq Hossain, “Bangladesh-India Relations: The Ganges Water Sharing Treaty and Beyond,” *Asian Affairs* 25, no. 3 (1998): 144-145.

③ Isher Judge Ahluwalia,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ICRIER, p. 321, http://jica-ri.jica.go.jp/IFIC_and_JBICI-Studies/jica-ri/publication/archives/jbic/report/paper/pdf/rp16_e09.pdf.

部也缺少共识。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因缺乏政府与私人投资，“南亚增长四角”动力不足，其中基础设施落后成为限制“南亚增长四角”目标实现的最大障碍。^①

在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政府（UPA）后期，印度对次区域合作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知。在南盟框架内合作踟躇不前的背景下，印度促成了 2013 年 4 月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举行的孟加拉国—不丹—印度三边会谈（BBI），并决定成立“水资源管理/电力与水电”和“联通/交通”两个联合工作组（JWGs）。^② 2014 年 5 月就任印度总理的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对南亚区域合作给予高度重视，决定绕开南盟框架，以次区域合作为突破口，寻求以次区域合作带动区域合作渐进前行的新路径。在此背景下，“孟不印尼”成为莫迪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DA）政府推进次区域合作的重要倡议。“孟不印尼”与“南亚增长四角”相似，两个倡议都强调成员国在互联互通、能源电力、过境与贸易和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然而，印度并没有沿用“南亚增长四角”概念，而是另起炉灶倡导“孟不印尼”合作，除追求次区域合作的主导权、变被动的参与方为积极的倡导者外，倡议的管理与决策机制也是印度弃用“南亚增长四角”的重要原因。“南亚增长四角”倡议的决策与管理原则明确规定，项目要由四国集体确定并选

^① Ishtiaq Hossain, “Bangladesh-India Relations: The Ganges Water Sharing Treaty and Beyond,” *Asian Affairs* 25, no. 3 (1998): 146–147.

^② 尽管此时印度官方还未正式提出“孟不印尼”合作，但随着尼泊尔的加入，印度官方和学界开始将 2013 年 4 月联合工作组的成立视为“孟不印尼”合作的开端。

择，但项目必须通过南盟行动委员会（SAARC Action Committee）依据《南盟宪章》第七条和第十条的规定加以实施。^① 然而，印度倡导的“孟不印尼”则不受《南盟宪章》的约束，这对未来灵活把握次区域合作的发展方向具有较为明显的现实意义。在此背景下，“孟不印尼”倡议得到印度莫迪政府的积极推动。

次区域电力与联通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孟不印尼”合作的重要内容。目前，“孟不印尼”合作已经建立了联合工作组机制。其中，“水资源管理/电力与水电”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讨电力贸易和电网联通的范围和潜力，推动四国在电力领域的经验交流与最佳实践分享，推动在水资源管理领域的水文数据分享以及探讨分享盆地水资源管理与开发的实践经验，建议并指导成立相关领域的专家小组等；“联通/交通”工作组的主要任务目标是推动以“南盟地区铁路协议”框架为样板的《孟不印尼铁路协议》的磋商进程，推动四国间基础设施分享和陆路口岸贸易便利化进程等。^② 经过多轮磋商与谈判，“孟不印尼”合作框架内的《孟不印尼机动车辆协议》（BBIN-MVA）于2015年6月正式签署。2017年4月，不丹以协议

① Madhukar SJB Rana, “The SAARC Growth Quadrangle,” *New Business Age*, July 2015, p. 32, <https://www.newbusinessage.com/MagazineArticles/view/1235>.

② MOFA, Government of Bangladesh, “The Second Joint Working Groups (JWG) Meetings On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Bangladesh, Bhutan, India and Nepal (BBIN),” <http://mofa.gov.bd/media/second-joint-working-groups-jwg-meetings-sub-regional-cooperation-between-bangladesh-bhutan>; MEA, Government of India, “Third Joint Working Group (JWG) Meetings on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Bangladesh, Bhutan, India and Nepal (BBIN),” January 19 – 20, 2016, http://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26284/Third_Joint_Working_Group_JWG_Meetings_on_SubRegional_Cooperation_between_Bangladesh_Bhutan_India_and_Nepal_BBIN_January_1920_2016.

对不丹的可持续性和环境影响为由退出《孟不印尼机动车辆协议》，并表示同意其他三方继续推进协议，即《孟印尼机动车辆协议》(BIN-MVA)。2022年3月，孟印尼三方签署备忘录决定推进《孟印尼机动车辆协议》。但是，亚洲开发银行已经将此前《孟不印尼机动车辆协议》框架内的项目列为其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计划的一部分予以支持，2022年世界银行南亚项目也决定为“孟不印尼”项目提供资金。^①目前，“孟不印尼”框架内的《孟印尼机动车辆协议》虽已达成但尚未完全生效，铁路联通协议开始讨论并已有前期收获，其他领域尚未进入正式谈判阶段。^②

“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与挑战。“孟不印尼”成员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政治稳定性、经济规模、发展水平、政策优先事项上各有不同，在主要安全关切上也各有侧重。目前，“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面临基础设施条件先天不足、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地缘政治环境不理想、利益集团抵制以及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等诸多挑战，如何在“孟不印尼”框架内协调各方诉求、在形成更大共识的基础上化解消极因素的影响，推进“孟不印尼”合作目标实现，是“孟不印尼”四国需要共同面对的现实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加强次区域互联互通并实现交通走廊向经济走廊转型，需要次区域各国和利益攸关方达成政治共识，而目前“孟

^① Suhasini Haidar, “Bangladesh, India, Nepal Move Ahead on Motor Vehicle Agreement Project,” *The Hindu*, March 9, 2022,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bangladesh-india-nepal-move-ahead-on-motor-vehicle-agreement-project/article65205145.ece>.

^② 张家栋：《“孟不印尼”合作倡议及其发展趋势》，《南亚东南亚研究》2021年第2期，第50页。

不印尼”更接近于交通走廊的概念，距离形成经济走廊可谓任重道远。

（三）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

与“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机制注重南亚次区域不同，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是第一个横跨南亚和东南亚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成立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的目的是创造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加快社会进步和促进成员国间合作的氛围。从组织发展过程考察，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经历了从“孟印斯泰经济合作倡议”（BIST-EC）再到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的发展历程。早期的孟印斯泰经济合作倡议由孟加拉国、印度、斯里兰卡和泰国组成，由泰国提出并于1997年6月创建。1997年12月缅甸加入后，组织名称变为孟印缅斯泰经济合作倡议（BIMST-EC）。尼泊尔和不丹于2004年2月加入后，该组织更名为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

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合作领域不断扩展。最初，“孟印斯泰经济合作倡议”涵盖6个优先合作领域，主要包括贸易与投资、交通与通信、能源、旅游、技术和渔业。2005年，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将农业、公共卫生、扶贫、反恐和跨国犯罪、环境与自然灾害管理在内的新领域纳入合作框架。2008年，气候变化被列入原有的优先领域，成为第14个优先合作领域。按照机制规定，每个成员国在特定领域担负领导责任。例

如，印度负责交通与通信、旅游、环境与自然灾害管理、反恐和跨国犯罪，孟加拉国负责贸易和投资，缅甸担负能源和农业，斯里兰卡负责技术合作，泰国承担渔业、人员往来和公共卫生方面的职责，不丹负责文化合作，尼泊尔负责扶贫合作等。多年来，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逐渐扩大了合作领域并使其多样化，尤其将安全问题，如打击恐怖主义和生态问题纳入合作范畴，反映了组织在应对新出现的区域问题和共同努力解决跨国问题方面的灵活性。2014年，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在达卡建立常设秘书处，负责协调该组织的活动和项目。

印度对深化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有浓厚兴趣。虽然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成立于1997年，但事实上它的初期发展并不顺利，受国家间关系掣肘、各国政府重视不足以及合作机制松散等因素的影响，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框架下的合作进展缓慢，有学者认为2004—2014年是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失去的“黄金十年”。^① 2014年以来，因南盟功能失调，印度开始致力于重振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希望通过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孟加拉湾地区经济一体化，挖掘未开发的贸易机遇，促进能源和粮食安全，促进其东北地区的发展。在莫迪政府推动下，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14年，第三届环孟加

^① 张赫、史泽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视角下的环孟加拉湾区域合作》，《区域与全球发展》2022年第1期，第43页。

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峰会在缅甸举行并决定在达卡设立秘书处，重启“货物贸易协定”与“服务和投资协定”谈判。2018年，第四届首脑峰会决定建立常设工作委员会（BPWC）以提高组织的运行能力。同时，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将合作扩展到军事安全领域，并且在2016年实现了金砖国家与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国家的领导人对话会。

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下的合作仍存在障碍因素。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作为孟加拉湾地区主要的次区域合作机制，在地缘政治经济的共同作用下获得迅速发展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地缘政治经济的冲突与合作属性也使得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① 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的目标是实现次区域或跨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然而现实是，它并没有比南盟国家内部存在的贸易模式做得更好。^② 截至2023年9月，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已经进行了20轮，但僵局仍在继续。2022年3月在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第五届峰会上，印度总理莫迪再次强调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必要性。总体上看，与南盟一样，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的机制化发展存在障碍，印度主导地位、印度与其他成员间的双边分歧，孟缅关系以及

① 卢光盛、李江南：《地缘政治经济视角下的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的发展及应对》，《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0年第3期，第51页。

② Reena Marwah, et al.,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in BIMSTEC: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Millennial Asia* 14, no. 3 (2022): 440.

泰缅关系等，都对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机制深化形成制约。

总体上看，南亚区域合作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目前已建立并达成了一些地区组织和合作倡议，并在多个领域开展了合作，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和“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然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机制的有效性受成员国间双边关系的严重制约，2016 年后该组织基本上处于停摆状态；“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具有可以逐步推动从政治到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领域发展的巨大的潜力，但印度的主导地位形象，其他成员国对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独特特征被影响的顾虑，尤其是成员国的权力不对称导致“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进展缓慢。同时，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的成效也不尽如人意，机制建设较为落后，取得的实质性进展微乎其微。概括而言，尽管南亚国家具有相似的地理、文化和社会特征，南亚仍然是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地区之一。

三、南亚区域合作面临的挑战

宗教、文化、历史都在不同层面上塑造了地区国家的区域认同。独特的地理单元，印度文化影响，共同反抗殖民统治的历史，相似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些因素对培育南亚区域认同有促进作用。但南亚地缘政治格局，国家间冲突与矛盾，域外力量影响等，

也对南亚区域认同构成阻碍。而南亚权力格局不对称，印巴关系僵局以及印度对南亚区域合作机制作用的认知变化，对南亚区域合作成效与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权力不对称：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以及小国对印度的不安全感

在区域组织中，当一个国家在权力上相比其他国家具有显著优势时，国家间很难建立平衡的关系。^① 南亚区域合作与次区域合作的成效较低，关键的结构障碍是区域制度的不对称性质。地理位置不对称、实力不对称以及由此导致的权力不对称，造成印度与南亚其他国家的不对称特征较为明显。孟加拉国倡导并推进南盟，表明南亚小国希望通过南盟机制为其提供一个平等的合作平台，但南亚国家的不对称尤其是权力不对称又导致南亚小国在与印度的互动中处于不利地位。总体上看，印度担心会遭到小国在南盟论坛中的反对，而小国则担心印度利用南盟强化其霸权。^② 这种权力不对称造成的结构性矛盾是制约南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因素。实际上，印度与南亚小国关系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对南亚区域合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印度是南亚事实上的霸权国家。长期以来，印度通过政治、经

^① T. P. Thornton,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Conflict Management,"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18, no. 1 (1991): 135.

^② M. Inayat, "The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A. J. K. Bailes and J. Gooneratne, M. Inayat, J. A. Khan & S. Singh, "Regionalism in South Asian Diplomacy," *SIPRI Policy Paper*, no. 15 (2007): 15.

济、外交和军事手段不断强化对其他南亚国家的影响。历史上看，自独立以来，印度以大英帝国在南亚的殖民遗产继承者自居，致力于维系与尼泊尔、锡金、不丹三个内陆小国的特殊关系，与巴基斯坦先后爆发三次大规模战争，1971年利用巴基斯坦国内矛盾策动东巴基斯坦地区独立为孟加拉国，1975年正式吞并锡金，1987年派遣维和部队直接干预斯里兰卡内战，1969年、1989年和2015年印度先后三次对尼泊尔实施经济封锁。目前，印度与不丹在本质上形成“保护与被保护”或“指导与被指导”的“特殊关系”，并不是现代国家间独立、自主、平等的关系。^① 尽管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倡导睦邻和不要求对等回报的“古杰拉尔主义”，其南亚政策显示出从军事和外交干预的硬实力战略向强调政府间合作、谈判解决和经济合作的软实力战略的转变，但有学者认为，“古杰拉尔主义”实际上试图将印度形象从地区恶霸转变为“良性霸权”，而且这种转变不是由于利他原因造成的，而是由印度20世纪七八十年代硬实力策略的失败、1991年后经济自由化需求以及印度对大国地位渴望导致南亚地区被赋予新战略价值驱动的。^② 可以说，印度的霸权地位以及南亚小国对主权安全和国内因素的强烈敏感，成为阻碍区域合作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印度的倡议经常被这些国家误解并

① 陈宇：《印度与不丹国家间“特殊关系”：过程、动因与影响》，《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2年第1期，第59—79页。

② Pratip Chattopadhyay, “The Politics of India’s Neighbourhood Policy in South Asia,” *South Asian Survey* 18, no. 1 (2011): 100.

定性为“霸权”。^①

印度在地理上位于南亚中心，南亚国家地缘结构不对称特征明显。在地理上，印度与大多数南亚国家（除两个岛屿国家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以及阿富汗外）接壤，然而没有两个南盟原始成员（阿富汗除外）彼此共享陆地边界。有观点认为，这种结构性不对称抑制区域合作。由于印度与大部分其他南盟国家接壤，大多数机制安排都以印度为中心，尤其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如移民、网络安全、跨国有组织犯罪等受广泛关注的地区安全问题，往往无法在多边平台上得到有效回应，大多是通过双边渠道来解决的。

印度的综合国力超过南亚地区其他国家的总和，权力不对称对区域合作的制约效应日益突出。南亚由一群经济和政治不对称的国家所组成，印度在地区内处于政治、经济、人口和军事的绝对领先地位。从数据上看，印度的国土面积、经济实力、资源禀赋和军事实力比其他南亚国家的总和还要大，这使南亚本质上成为一个以印度为中心的地区。甚至可以说，南亚地区的权力极性显著，印度位居区域权力“金字塔”的顶端。^② 尤其是在印巴对抗背景下，印度倾向于认为，在巴基斯坦的领导下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可能会联合起来反对印度。同样，由于印度规模较大、人口众多、经济比较发达和技术基础更加广泛，这一系列的不对称，使该地区的小国对印度

^① K. Bajpai, “Security and SAARC” in E. Gonsalves & N. Jetly (eds.), *The Dynamics of South Asia: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SAARC*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9), pp. 75–90.

^② 陈翔：《“回归区域”？——理解全球安全治理区域化的演进》，《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8期，第59页。

可能的主导地位产生不安全感。因此，南亚小国希望通过南盟机制防止优势大国印度的霸权行径，特别是在次大陆建立新的强制性秩序方面通过南盟制约印度。

印度的权力地位是客观存在的，南亚国家倾向于建立新的区域倡议和对话而不是完善现有合作机制，这导致南亚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的成效都不尽如人意。而在次区域层面，“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实现一体化和形成政治共识的主要挑战之一是规模、地理位置和其他因素造成的权力不对称。不丹和尼泊尔等较小的国家通常认为，区域内贸易的增加意味着印度等较大经济体的主导地位 and 自身对其依赖程度的增强。在这个次区域，其他国家对印度的贸易逆差很大。此外，成员国从合作倡议中获得的收益不平等，也往往限制了彼此间的合作。

（二）国家间冲突矛盾与《南盟宪章》缺陷

南亚的地区主义从一开始就存在问题，因为南亚一直受到国家间和国内冲突的困扰，而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矛盾与冲突是制约南亚区域合作的主要障碍。南盟第十九届峰会计划于2016年11月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但受印巴双边关系紧张影响，峰会遭到推迟，因印度带头抵制峰会，南盟被迫停摆。尽管印度莫迪政府推进其“邻国优先”政策，但印度孤立巴基斯坦并致力于将巴基斯坦挤出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意图十分明显。在此背景下，印度与巴基斯坦区域认同错位进一步显化，南盟机制被弱化，“孟不印尼”次区

域合作和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等未包括巴基斯坦的次区域合作机制受到印度重视。

政治互信始终是南亚区域合作的主要障碍，而印巴矛盾是南亚区域合作低效甚至失效的核心因素。客观上分析，南盟的有效性取决于印巴关系是否正常化。理论上，正常的印巴关系将为地区所有国家带来多重利益，包括减少国防开支，通过增加贸易和分享南亚的水、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以促进经济增长，并为进一步一体化空间提供条件。印巴未能实现政治和贸易关系正常化，直接阻碍了南盟机制的发展，但反过来又成为推动次区域合作机制建设的重要因素，导致南盟机制的影响被稀释。印巴对抗以及地区国家间互信程度有限，导致地区认同度较低，区域合作机制尤其是南盟机构更像“清谈馆”，甚至是彼此间“竞争性欺骗讲坛”。

次区域合作同样受困于高政治议题。有学者认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南盟的相对不作为是地区其他国家加入双边、次区域和区域外协议的主要原因，而且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顽固立场实际上已经导致南盟框架不合时宜。^①为此，一些国家试图通过次区域合作机制来绕过陷入长期僵局的南盟。而且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会在南盟失败的方面取得成功，因为其成员主要以经济利益而不是政治利益为导向，在巴基斯坦缺席的情况下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将成为友好国家的成功尝

^① S. G. Pandian, "Moving South Asia's Economies beyond the Indo-Pakistan Paradigm in the South Asian Regional Association for Cooperation,"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11, no. 3 (2002): 329-344.

试。事实上，次区域合作同样面临成员间不信任形成的挑战。

《南盟宪章》在处理高政治议题上存在先天不足。《南盟宪章》第 10 条强调协商一致性原则，但规定双边和有争议的问题应排除在议程之外。^① 南盟缺乏解决或调解双边冲突的机制安排，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为解决影响区域合作前景的问题而进行的任何有意义的对话。而且，南盟成员也忽视了它们在地理上相互联系并面临共同挑战的事实，没有就威胁认知达成共识，在彻底解决跨境恐怖主义问题上也陷入制度性困境。

（三）印度对区域合作认知变化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南盟成立时，印度只是一个不情愿的被动参与方。随着经济改革深入，印度开始重新审视南亚地区的经济机遇，并逐渐放弃对双边主义的偏好而转向多边接触，从一个不情愿的参与者变为积极参与者。在 2007 年举行的第 14 届南盟峰会上，印度将其对该地区的政策定义为“不对称责任”，即提供单方面让步而不期望互惠，这表明印度已经找到了积极参与南亚区域合作的外交政策路径。

印度人民党 2014 年执政以来，随着“邻国优先政策”出台，印度对区域合作的立场出现更为积极的变化——从积极参与者变成了推动区域合作议程的主要引领者。2014 年 5 月 26 日，印度总理莫迪邀请所有邻国的国家元首参加其宣誓就职仪式。莫迪政府积极

^① SAARC Charter, <https://www.saarc-sec.org/index.php/about-saarc/saarc-charter>.

推动区域和次区域层面合作，使其日渐成为印度邻国优先政策的重要工具。印度重视区域与次区域合作，主要是出于两个因素：第一，对印度来说，南亚地区的重要性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地理上的既成事实，而是因为它作为基于“共同遗产”的连续文化空间的重要性需要得到培育和维持；第二，由于其所处的中心地理位置及作为地区实力国家，印度有推动区域与次区域合作的先天优势。^① 这是印度莫迪政府自 2014 年以来积极推动区域与次区域合作的重要原因。

面对南盟发展困境，印度被迫改变追求区域合作的路径与方向。长期以来，南盟成员国一直在努力达成一项旨在深化区域内贸易、旅游和互联互通的区域机动车辆协定。尽管 2014 年 9 月政府间运输工作组（IGGT）批准了关于“南盟机动车辆协定”的专家组报告，但因成员国（巴基斯坦）持保留意见，南盟第十八次首脑会议仍未能签署“南盟机动车辆协定”。随后印巴矛盾因恐怖袭击事件升级，南盟峰会停摆，印度被迫得出南盟对其不重要结论，^② 甚至通过抵制南盟峰会实现孤立打压巴基斯坦的战略目标。在此背景下，在南盟框架外倡导次区域合作成为印度追求区域合作的“另一种出路”。对于印度绕开南盟推进“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和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等次区域合作倡议，有学者认为，

① Smruti S. Pattanaik, “Sub-regionalism as New Regionalism in South Asia: India’s Role,” *Strategic Analysis* 40, no. 3 (2016): 210–217.

② Partha S. Ghosh, “An Enigma that Is South Asia: India versus the Region,” *Asia-Pacific Review* 20, no. 1 (2013): 100–120.

基于印度的认知先验，区域多边主义的全球规范已被本地化为主要受印度影响的多边主义模式。因此，实际上从来没有任何真正的多边合作的余地，而实际的合作结果只在双边领域中出现。^①

综合来看，目前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分歧和长期的双边争端，导致南亚区域认同度较低，南亚区域合作深化有限，南盟机制功能几近失效。客观上，南盟未能利用区域内贸易潜力的重要原因是南亚成员国间分歧矛盾较为突出，尤其是印度与巴基斯坦对区域认同的错位。有学者将南亚列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地区之一，^②一些分析人士也认为南盟在减少双边紧张局势、加强区域安全和促进人民经济福祉方面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③但南盟过去近40年的发展也表明，成员国至少在某些方面认为南盟是有益的，南盟国家不愿意承担被排除在区域合作之外的成本，以及区域和全球利益层面的潜在负面影响。^④

四、结语

相较于世界上其他地区，南亚在接受区域主义和区域组织的概

① Arndt Michael, "Cooperation is What India Makes of It—A Normative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and the Indian Ocean," *Asian Security* 14, no. 2 (2018): 119–135.

② C. R. Mohan, "India and the Asian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M. J. Green & B. Gill (eds.), *Asia's New Multilateralism: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the Search for Community*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31.

③ Suman Sharma, "India and SAARC," *India Quarterly* 57, no. 2 (April 2001): 115.

④ Zahid Shahab Ahmed and Munir Hussain, "Lesson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s Economic Integration for South Asian Regionalism," *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35, no. 3 (2019): 329.

念方面较晚。概括而言，南亚小国在很大程度上渴望加强区域内部的整合，但是南亚的区域主义一方面鼓励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另一方面限制政治安全一体化以及共同价值观和规范。客观上，南亚地区的政治与安全决定了南亚区域合作的成效。目前，在威胁感知、外交政策取向、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对关键地区大国作用等方面都未形成共识的背景下，南亚区域主义在概念上是狭隘的，在议程上是有限的，不足以解决区域和平与安全的问题。

作为南亚区域合作的典型案例，南盟在贸易等领域取得一定进展，但其低效甚至失败更为明显。有学者认为，南盟的建立主要出于政治目的，区域国际关系模式也决定了南亚区域主义的结果。经济社会发展是南盟成立的初衷，但其运作方式是政治的和战略的，这导致南盟目标逐渐受到侵蚀。^① 除南盟外，次区域和跨区域合作也是南亚区域主义发展的两个重要方向，这虽然是对南盟代表的区域主义的有益补充，但也对南盟机制形成稀释效应。尽管印度主导的以限制巴基斯坦影响为目的的次区域合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印巴矛盾对区域合作的负面影响，印度国家主导力也对推动南亚次区域一体化产生积极影响，^② 但合作机制内的权力不对称以及机制成员间的政治互信问题，也导致次区域合作进展缓慢。同时，尽

^① Bhumitra Chakma, *South Asian Regionalism: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Bristol: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2020).

^② 邱实、蔡立辉：《印度在南亚区域合作中的主导性影响》，《南亚东南亚研究》2021年第5期，第17—29页。

管印度自认为是该地区的天然霸主，但南亚缺乏霸权安全秩序，^①印度的影响相对有限，对其试图主导区域合作形成制约。

在南亚，南盟、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和“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对区域主义的三大支柱——政治、经济和身份认同的选择不全面，导致在构建明确成员国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指导利益的连贯区域合作安排方面存在不足。因缺乏同质化的政治动力、强大的制度架构和社会化，南盟以及一些次区域合作机制在解决成员国的安全困境方面没有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如果南亚不能优先考虑安全困境，不能塑造政治和谐，不能形成经济相互依存，不能形成地区认同，那么南亚的区域主义就只能停留在浅层的区域一体化阶段。^②换言之，除非南亚国家的优先事项从传统安全转向普遍意义的人类安全，从竞争安全、主导安全转向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否则南盟以及其他次区域合作机制将很难摆脱“僵尸机制”的宿命。

① Shrikant Paranjpe, “Development of order in South Asia: Towards a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Parliament,”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11, no. 3 (2002): 345–356.

② Aditi Paul,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Exploring the Three Pillars of Regionalism and Their Relevance,” *The Journal of Indian and Asian Studies* 1, no. 2 (2020).

Contents

Editor-in-Chief's Note

Reflections on the Subject Construction of Area Studies *Zhang Yunling / 1*

Area Studies

Regional Ident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Wu Zhaoli / 21*

Compared with other regions in the worl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started late and has been less effective. South Asian countries differ in terms of regional identity and regional orientation. On the one hand, unique geographical units, Indian cultural influences, a history of common resistance to colonial rule, and similar stag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v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fostering regional identity in South Asia. On the other hand, factors such as the geopolitical pattern, inter-state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and the influence of extraterritorial forces in South Asia also pose obstacles to the regional identity of South Asia. Moreover, the asymmetrical power relations in South Asia, the impasse in India-Pakistan relations, and the change in India's perception of the role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in South Asia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effectiveness and proces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This paper takes SAARC, BBIN, and BIMSTEC as typical cases to analyze the progress, effectiveness, and direction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Interactive Practices of Regional Identity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Geng Xiefeng Chen Lingzhi / 52*

East Asia is a region crossed with diverse and united, traditional and modern,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global North-South, regional and global, real and imagined features. Such distinctiv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re not